

# 试论北宋前期的文化重心

## ——以学术中心、教育状况作为考察的重点

康保苓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浙江杭州 311231)

[摘要]文化重心是指在全国范围内文化特别发达的区域,是诸多文化质点、文化要素等的集聚,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通过对各类人才、书籍状况的统计分析,得出下列结论:北宋前期,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差距逐渐缩小,但总体而言,北方文化还占优势地位。中国文化重心仍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北宋四都——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以及太原等地文化较为发达。

[关键词]文化重心;人才;教育状况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05)01-0036-06

学术界在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完成的时间上尽管存在分歧,但在唐宋时期中国文化重心南移趋势这一点上基本达成共识。应当注意到,学术界对宋代中国文化重心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特别是对北宋文化重心进行综合、全面考察的论著很少,学者们在谈及这一问题时大多用一两句话笼统带过,有些论著只涉及某一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文化重心的南移是一个动态的、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时,由于南宋时北中国的大部分领土被金占据,文化重心当然位于南方,因此,笔者主要考察北宋的文化重心。还应看到,从大的趋势来讲,文化重心是从北到南的转移,但具体到一定地域、一定时期,转移的路线、速度等又是不同的。笔者采用尽可能多的资料,运用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将文史地有机结合,分北宋前期(太祖、太宗、真宗朝)、中期(仁宗、英宗朝)、后期(神宗——钦宗朝)三个时期,对北宋文化重心进行较全面的研究,初步探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重心的动态发展历程。限于篇幅,本文推出的是北宋前期的文化重心(北宋中后期文化重心另有专文详述)。

###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考察北宋文化重心之前,有必要对几个基本概念进行界定。

#### 1. 文化

从“文化”一词的起源来看,“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说文解字》中说:“文,错画也,象交文”。从这些基本

含义出发,“文”引申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道德教化等内容。“化”本义有生成、造化的含义,引申为通过教化学习使之向善等意义。“文”与“化”合用,始见于汉代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在这里,“文化”一词与“武功”相对,含教化之意;“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化”连用,具有文治、文明、改造、教化的含义。

“文化”一词在西方来源于拉丁文 culture,原意指农耕和培育、练习、拜神等。15世纪以后,引申为对人的道德和能力的培养也称为文化。英国人类学家、进化论学派的创始人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最先把“文化”作为专门术语来使用,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sup>[2](P99)</sup>

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古今中外人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给“文化”下的定义不下二百种,最常见的是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也称为广义的文化。各个层面的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制约、彼此渗透、交叉影响的。物质文化的变化可以引起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的变化;精神文化的变化又会对整个文化的变迁、发展起重要作用。

“文化”,就其狭义而言,主要是指精神层面的内容。本文所涉及的文化,主要指精神文化,具体而言,是以学术中心(含儒学、文学、艺术、科学等)、教育状况(含科举、学校、书院等)作为考察的重点。

[收稿日期]2004-04-09

[作者简介]康保苓(1973-),女,山东青州人,浙江旅游职业学院讲师,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旅游文化学、休闲学。

## 2. 文化重心、文化中心

国内外学者在这两个概念上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二者含义相同,所指为一个地区;夏定域《东吴时之文化》、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第一章“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中,文化中心也指一个地区;慈南译《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之转移》一文中,文化中心指都城与城市;卢云认为文化重心与文化中心的含义基本相同,他认为文化重心(中心)应该具备两条标准:“第一: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它应指一个文化特别发达的区域,而非指某个文化教育、艺术活动的中心地点(如都市等),尽管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该区文化代表着那一时代的主要精神与中心内容,并向周围地区逐渐传播,产生影响。”<sup>[3]</sup>我基本同意卢云先生对文化重心特点的概括,但我认为,文化重心又不完全等同于文化中心,文化重心是指在全国范围内文化特别发达的区域,是诸多文化质点、文化要素等的集聚,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侧重于强调文化力的辐射功能;文化中心指文化教育、艺术活动的中心地点。从范围上看,文化重心包含多个文化中心。一定时期的文化中心可以有多个,但文化重心只能集中于某一地区。

### 3. 关于“南北”的界定

从地域风貌的角度将文化进行划分的传统由来已久,先秦时东西差距较大(主要指夷夏之别),汉代以后,南北差异较大。季羨林先生指出:“就世界范围来说,文化的分野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就中国来说,文化的分野却是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sup>[4]</sup>袁行霈先生也指出:“中国文化的地域性,主要表现为南北两个地区的差异。东部和西部虽说也有差异,但相对说来不那么显著。”<sup>[5]</sup>(P33)大致来讲,宋代以前南北分界以秦岭——淮河为界,元代以后,以长江为界。文中进行量化比较,也必然涉及到南方与北方,本文所指的南北,以秦岭——淮河为界,该线以北为北方,以南为南方,并不严格按照路的划分。因为该线不仅是气候、土壤与作物的分界线,而且是南北文化景观的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的南北近区,就是中国南北文化、南北文学地理分野的模糊区与感觉区。”<sup>[6]</sup>(P14)“中国古代文学地域特征东西分别小而南北差异大。中国的南北学风、文风的炽盛与迁变,和中国文化地理中心从西北走向东南,从内陆走向沿海的迁移规律相一致。”<sup>[6]</sup>(P15)

### 4. 文化重心转移完成的标准:

文化重心转移完成的标准问题,以往的论著中尚未见到,本文认为,文化重心转移完成至少应具备以下标准:

第一:文化重心所在地区的文化发达程度明显超过其它地区,表现在人才(文学家、科技人才、艺术人才等)数量多、教育(学校、书院、科举等)发达、学术水平高等方面;

第二:文化重心区的文化优势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也就是说,在以后较长时期内,这种优势地位还在延续着;

第三:文化重心南移的区域是指移到了秦岭——淮河以南。

## 二、北宋前期文化重心考察

本文主要从学术中心、教育状况等方面对北宋的文化重心进行考察。“学术”,按《辞海》解释,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梁漱溟先生在《论学术的内涵及分类》一文中,将古今东西学术分为四大类别,即“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修持涵养——简称修养”<sup>[7]</sup>(P180),据笔者理解,前三类主要是群体智慧的创造和反映,是很容易被感知的存在,是比较具体的;后一类主要指个体的修身养性而言,是人生境界所达到的程度,是较为抽象的。本文所指的“学术文化”,采纳了梁先生的大部分意见,将其限定在比较具体的范围之内,详细来说,包括宋代的思想学说、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类文化人才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文化成果等等。学术文化是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如文化、经济等)和时代风貌。加之宋代学术文化繁荣,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其在哲学,始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著之桎梏,以新意说经。后乃有周、程、张、邵、朱诸大家,蔚为有宋一代之哲学。其在科学,则有沈括、李诫等历数、物理、工艺,均有发明。……考证之学,亦至宋而大盛。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势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sup>[8]</sup>因此,本文把学术文化作为考察的重点之一(含儒学、文学、艺术、科学等)。教育状况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不仅反映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而且与各类人才的成长、地区文风的兴盛密切相关。本文将科举、学校、书院等作为考察的又一重点。基于此,文章所涉及的文化要素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 其一:各类人才的分布

人才的产生受社会政治、经济、地理环境以及家族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也与上述要素密切相关。一般而言,人才分布密集的地方,文化必定发达。因此,人才的多寡是衡量某一地区文化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通过了解各地人才地理的分布,可以揭示某一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历史发展规律,探索该地文化生态系统的运作状况。

#### (1) 政治人才

本文主要以宰辅为例进行统计分析。宰辅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舞台上最高层领导人物,是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步入仕途后的奋斗目标之一,也是无数文人努力争取的最高职位。宋代的宰辅包括宰相和执政。宋前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平章事、尚书左右仆射、左右丞相、侍中为宰相,以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枢密使、枢密副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等为执政。北宋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分割宰相的权力,如在宰相之下添设“参知政事”作为副贰,以枢密使分取宰相的军政大权,以三司使分取宰相的财政大权等等,参知政事等执政的权力和宰相的权力是不相上下的。因此,执

政作为最高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和宰相一样,均在本文政治人才的考察范围之内。北宋九朝,“始建隆庚申,终靖康丙午,凡一百六十七年,居相位者七十二人,位执政者二百三十八人。”<sup>[9]</sup>(卷210《宰辅表一》)通过检索《宋史·宰辅表》、《宋宰辅编年录》(徐自明撰,北京中华书局校本 1986 年版),根据宰辅籍贯制成《北宋宰辅籍贯分布统计表》。

北宋宰辅籍贯分布统计表

北方	前期	中期	后期	南方	前期	中期	后期
河北西路	14	7	2	两浙路	2	9	13
开封府	9	4	11	福建路	1	4	19
京东西路	9	6	7	江南东路		2	3
河北东路	8		4	江南西路	2	3	6
河东路	8	6	1	荆湖北路			3
京西北路	6	9	3	京西南路			1
京东路	5	5	1	淮南东路	1		4
永兴军路	1	1	1	淮南西路	1	1	2
京西南路			2	成都府路		1	7
秦凤路			1	利州路	1	2	1
淮南东路		1	1	梓州路	1		
淮南西路			2				
小计	60	39	36		8	22	59
合计	135			89			

北宋前期,以宰辅为代表的政治人才北方占绝对优势(这与最高统治者的用人政策有很大关系),共有 60 人,南方共有 8 人。具体到府、州而言,以开封府(9 人)、河南府(5 人)、应天府(4 人)、沧州(4 人)、真定府(4 人)、卫州(4 人)、汾州(3 人)等地出宰辅多。南宋时期的陆游对北宋的人才选用作过总结,认为仁宗朝打破南北成见,大规模地任用南方人,至哲宗、徽宗朝,用南方人更多,从而促进了南方人才的勃兴,“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苏州地区),欧阳修起于楚(江西吉安),蔡襄起于闽(福建仙游),杜衍起于会稽(浙江绍兴地区),余靖起于岭南(广东曲江)。皆为一时名臣,号称圣宋得人之盛。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sup>[10]</sup>(卷3《论选用西北士大夫礼》)稍迟于陆游的陈傅良亦记载了仁宗朝将相大臣多出身东南的现象:“方国家肇造之初,将相大臣多西北旧族,而东南未有闻者。既而天下平,七八十载之间,而范(仲淹)公起吴,杜(衍)公起越,欧阳(修)公起庐陵,孙公起富春(浙江富阳),盖汉一大郡之地,而二三公皆一时之望,于是东南人物遂擅天下。”<sup>[11]</sup>(卷41《跋孙氏志述》)

## (2) 文学、哲学、艺术人才

主要指诗人、词人等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书法家等,他们是精英文化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哲学、艺术作为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是文人思想、情感、心灵状态的反映,

是他们与现实世界的审美把握,是时代精神风貌的体现,是一个时代精英文化发展趋向的标志。因此,从文学、哲学、艺术人才的分布状况,也能反映某地文化发达程度(至少是本土文化的发达程度)。

列入本文考察范围的文学家、儒学家、艺术家的标准如下:(1)文学家,包括《宋史·文苑传》、《东都事略·文艺传》(扫叶山房本,上海精一阁藏版)、《宋史翼·文苑》有传者;《郡斋读书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著作传世者;《全宋词》、《全宋诗》、《全宋文》有诗文著录者。(2)哲学家,主要以儒学家为考察对象,包括《宋史·儒林传》、《东都事略·儒学传》、陆心源辑《宋史翼·儒林》(文海出版社印行,1970 年版)有传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7 年版)有记载者。(3)艺术家,包括《宋史》、《东都事略》、《宋史翼》、俞剑华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 年版)等书籍中记载的有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才能的人。本文通过检索以上有关书籍,分北宋前期、中期、后期,制成《北宋文学家、艺术家、儒学家统计表》。

从统计表可以看出:北宋前期儒学家北方明显多于南方。北方京东西路 16 人,京东路 12 人,河南府 10 人,河北东路 5 人,开封府 4 人,京西南路 1 人。

北宋前期北方文学家略多于南方。文学家北方 318 人,其中京西北路 53 人,开封府 51 人,永兴军路 45 人,河东路 36 人,京东西路 34 人,京东路 30 人,河北东路 29 人,河北西路 28 人,淮南东路(北方)5 人,秦凤路 4 人,京西南路 2 人,淮南西路(北方)1 人;南方 304 人,其中两浙路 83 人,福建路 62 人,江南东路、成都府路各 34 人,江南西路 30 人,荆湖南路 13 人,荆湖北路 9 人,淮南东路、梓州路 8 人,广南东路 7 人,利州路 6 人,淮南西路 5 人,广南西路 3 人,夔州路 2 人,京西南路 1 人。从府、州情况看,北方以开封府(51 人)、河南府(33 人)、太原府(21 人)、京兆府(20 人)、大名府(19 人)、宋州(9 人)、青州(8 人)等地文学家较多;南方以杭州(32 人)、泉州(28 人)、成都府(24 人)、徽州(13 人)、建州(13 人)、福州(10 人)、江宁府(9 人)、洪州(8 人)文学家较多。

从艺术家的情况看,北方多于南方,北方 76 人,其中永兴军路 17 人,开封府 15 人,京西北路 11 人,燕山府路 7 人,京东路 6 人,河东路 5 人,河北西路、秦凤路各 4 人,京东西路 3 人,河北东路、淮南东路(北方)各 2 人;南方 40 人,其中成都府路 14 人,两浙路 10 人,江南东路 7 人,江南西路 4 人,福建路 3 人,荆湖南路、广南东路各 1 人。再具体一些,艺术家北方以开封府(15 人)、京兆府(11 人)、河南府(9 人)较多;南方以成都府(11 人)、杭州(5 人)、江宁府(5 人)较多。

## (3) 科技人才

科技人才包括具有天文、历算、医学等专业知识的人才,他们大多好学善思,博涉群书,不仅具有某种技能,而且还著书立说,发明创造,构成特殊的文化阶层。科技人才的分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化发展状况。本文通过检索《宋史》、《东都事略》、《宋史翼》等史书,制成《北宋科技人才统计表》。

北宋科技人才统计表

北方	前期	中期	后期	南方	前期	中期	后期
开封府	5	2	3	越州			2
青州	1			婺州			3
沂州			1	明州	2		
应天府	2			温州			4
广济军			2	楚州			1
济州	1			真州			1
单州			1	无为军			1
河南府	4			蕲州		1	
郑州	1		1	宣州			1
孟州		1	2	徽州	1	2	2
汝州			1	太平州	1		
大名府			2	洪州			
沧州	1			吉州			2
博州		1		潭州	1	1	
棣州	2			福州			1
真定府	1	1		泉州	1		
赵州	1			眉州			1
绛州	1			临江军		1	
京兆府	2						
河中府	2						
邠州	1						
亳州	1	1					
寿州		2					
小计	26	8	13		6	5	20

从表中可以看出,北宋前期北方的科技人才有 26 人,以开封府、河南府为多;南方有 6 人,北方占有绝对优势。

#### (4) 状元、省元的分布

状元、省元是科举取士的佼佼者。笔者通过分析《北宋状元、省元地区分布表》得出结论:北宋前期,北方状元 24 名,南方状元 8 名,北方状元明显多于南方。北方又以京西北路(7 人)、京东西路(5 人)、开封府(4 人)为多。北方出现了三对父子状元,即开封襄邑的张去华、张师德父子,河南府的安德裕、安守亮父子,郢州的梁灏、梁固父子,南方出现了一对兄弟状元,即阆州的陈尧叟、陈尧咨兄弟,这些堪称状元家族。状元家族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与该家族的文化背景、遗传智力因素、家学传统等有密切的关系。同时,金榜题名的荣耀、仕途的得意、诗礼传家的榜样、敦厚儒雅的士风,又会对一般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产生极大的影响。

北宋前期北方省元 12 名,南方 6 名,北方是南方的两倍。北方以京西北路最多,共有 5 名。

#### (5) 藏书家

藏书家作为私人藏书活动的主体,主要集中于文人士大夫阶层。藏书家的存在,是文化意识浓厚的反映。我国古代私人藏书出现得很早,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文化的下移,百家

争鸣,学风开放,为私人藏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墨子、惠施、苏秦等就是早期藏书家的代表,《墨子·贵义》中说:“子墨子南游使卫,篋中载书甚多”。但由于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如印刷术发明、普及之前,大量书籍只能靠写本形式流传等),当时私人藏书的规模很小,条件也较为简陋。到了宋代,随着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书籍得以大批量地生产和流通,私人藏书规模不断扩大,藏书家的队伍也日益壮大,“……加以雕版流行,得书较易,士大夫以藏书相夸尚,实开后世学者聚书之风”<sup>[12](P179)</sup>。尽管私人藏书的动机不尽相同,或为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或为了修身养性,作为寄寓情怀、独善其身的精神寄托……但客观上,私人藏书却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利于文化典籍的保存。第二、有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学风的形成。一方面,藏书家多为博学的学者或政治家,他们利用自身拥有的书籍资源,进行学术研究,或与他人交流切磋,促进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有些藏书家将藏书与育人结合起来,慷慨外借图书,泽及士林,有利于地区学风的形成。从学术文化的发展来看,一个地区学风浓厚,容易造就人才,而学风的兴盛,常常靠学术人的提倡。不管是开创风气的人,还是追随风气抑或矫正风气的人,都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许多藏书家就是这样的学术中人。

基于以上分析,藏书家及藏书文化也是文化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宋代雕版印刷普及,宋代私人藏书家众多,藏书量丰富,这从藏书家藏书处所的名称就能反映出来,象朱昂的万卷阁、沈立的万卷堂、司马光的读书堂、田伟的博古堂、吴良嗣的箴金堂等等。从私家藏书的数量上看,也是十分可观的。著名藏书家江正(江南人)藏书数万卷,濮州的张昭藏书数万卷,宋敏求(赵州平棘人)“家藏书三万卷”<sup>[9](卷29)(宋敏求传)</sup>,王钦若藏书四五万卷,司马光藏书万余卷等等。本文将北宋的藏书家也列入考察的范围之内。学术界有关藏书家方面的著述主要有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杨立诚、金步瀛《中国藏书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关于宋代的有潘美月《宋代藏书家考》(台湾学海出版社,1980年版),考稽宋代藏书家 126 人;方建新《宋代私家藏书补录》(《文献》1988 年第 1、2 期)补辑宋代藏书家 160 人;刘汉忠《宋代藏书家拾遗》(《四川图书馆学报》,1989 年第 3 期),补辑宋代藏书家 54 人;林平《宋代私人藏书补遗》(《四川图书馆学报》,1990 年第 1 期),补辑宋代藏书家 43 人;刘汉忠《宋代私家藏书拾遗补》(《四川图书馆学报》,1990 年第 4 期),又补辑 23 人;范凤书《宋代私家藏书再补遗》(《四川图书馆学报》,1992 年第 2 期),补充宋代藏书家 167 人。笔者参考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去其重复,制成《北宋藏书家统计表》

从中可以看出,北宋前期,北方藏书家较多,尤其是开封府、太原府、河南府、徐州等地,南方的杭州较多。开封祥符的丁頌,“尽其家资,聚书至八千卷,为大室以贮之”<sup>[13](P5)</sup>。河南洛阳的赵安仁(958 - 1018),历太宗、真宗两朝,官至御史中丞,他“尤嗜读书,所得禄赐,多以购书。……时阅典籍,

手自仇校。三馆旧缺虞世南《北堂书钞》,惟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内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诏褒美。尤知典故,凡近世典章人物之盛,悉能记之。<sup>①91</sup>(卷287(赵安仁传))

北宋藏书家统计表

北方	前期	中期	后期	南方	前期	中期	后期
开封府	5	4	2	杭州	3	2	4
青州	1		1	苏州	1	2	2
密州			1	常州			3
齐州	1		1	湖州			2
宋州	2	2		越州	1		3
徐州	3	1		明州			2
东平府			2	台州			2
济州		1	1	温州			1
河南府	3	3		处州		1	
郑州	1		2	扬州	1	2	2
顺昌府		1		庐州	1		
大名府	2	1	1	和州		1	
开德府			1	蕲州			1
永静军			2	黄州			1
卫州		1	1	江宁府			1
深州	2			徽州		2	
庆源府		2		信州		1	
太原府	4			江州	1	1	
泽州	1			洪州	1	1	
京兆府	2		2	临江军	1	1	2
陕州			1	吉州		2	5
同州	1			抚州	1		1
华州	1		1	赣州			1
秦州		1		建昌军		2	
陇州		1		南康军		1	
亳州		1	1	潭州	1		1
幽州	1			福州			1
				建州	1	3	2
				邵武军		1	1
				泉州			1
				漳州			3
				兴化军			4
				成都府	2	1	2
				蜀州		1	
				眉州	3		1
				陵州	1		
				梓州		1	
				荣州		1	2
				阆州		1	
小计	30	19	20		19	28	51

## 其二、书籍的统计

书籍是由知识分子编纂或创作的文化成果,是各种文化的精华所在,代表着时代文化的发展水平。书籍数量的多寡,也是衡量某地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志。通过检索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81年版)、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等资料,按以书系人、以人系地的原则,分北宋前期、中期、后期,制成《北宋书籍统计表》。北宋前期,书籍总量南方多于北方。北方书籍96部,河北东路(27)、京东西路(140)、河北西路(13)、京西北路(12)、开封府(10)较多,按州统计,以开封府(10)、大名府(10)、开德府(10)、深州(8)、河南府(9)、应天府(5)等地出书籍为多;南方书籍108部,以两浙路(33)、福建路(20)、成都府路(15)较多。江南西路(12)、杭州(15)、苏州(8)、福州(7)、抚州(6)、建州(5)、成都府(5)等地出书籍多。

## 其三、学校、书院的分布

教育的普及是文化繁荣的另一重要标志。宋代教育就学校类型而言,分为官学、私学、书院三类(因为宋代有些书院具有官私合办的特点,故将其单独归为一类),官学又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本文根据现存地方志的记载,将各路学校、书院按数量列表。

从地方官学的规模或者是质量上看,北方比较发达。解州闻喜县县学,始建于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有左右起讲堂、致斋堂凡24楹,学室五栋。程民生先生研究指出:“北宋前期三朝,文教事业尚在草创阶段,官方学校教育尚未制度化,没有普及。北方地区得风气之先,京师开封府、京东应天府、京西河南府等地形成了当时教育的重心所在。其他地区零星的州、县学,或是地方自建,或是因循旧学,整体上说还是比较落后的。”<sup>①141</sup>(P210)

从主要书院的规模及影响来看,南北大致均衡。王应麟《玉海》卷一六七和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考》列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为“天下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在庐山白鹿洞,兴盛时期是在南唐,宋初趋于衰落,“江州白鹿洞,李氏日常聚书籍,以招徕四方之学者。有善田数十顷给之。选太学中通经者,授以他官,领洞事,以职教授。自江南北,为学者争凑焉,常不下数百人。厨廩丰给。太平兴国初,洞主明起建议以田入官而齿仕籍。得蔡州褒信簿。既乏供馈,学徒日散,室庐隳坏,因而废焉。”<sup>①151</sup>(卷61《白鹿洞藏书》)另据学者考证,北宋阶段“从太平兴国元年或开宝九年开始,至皇祐末(公元1054年)白鹿洞书堂毁于兵灾”,该书“确有教学活动的时期大概只有7到9年”<sup>①161</sup>(P162)。岳麓书院在潭州善化(今长沙市)岳麓山抱黄洞下,其前身为僧人智璇建立作为聚书讲学之地,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通判孙逢吉增拓为书院,有讲堂5间,斋舍52间,该书院具备讲学、藏书、祭祀等功能,咸平四年,知州李允则为书院请得国子监诸经义疏、释文以及《史记》、《唐韵》等书。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周式首任山长,教授数百人。八年,宋真宗召见周式,命为国子监主簿,使归教授,增赐内府秘籍和岳麓书院匾额,书院名声大震。应天府书院位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西北,最早开办于后晋,是虞城人杨怒创建的一所私立学校,后来从中毕业的名儒戚同文在这里聚徒讲学。宋初由此而等第者达五六百人,宗度、

许骧、陈象舆、高象先、滕涉等成为朝廷重臣。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郡人曹诚就其地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卷,并将其捐给政府。真宗皇帝听说后,下诏立为书院,让戚同文的孙子戚舜宾担任主讲,曹诚为助教。当时四方士子慕名而来,“讲议乎经,咏思乎文”,“二十年间,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sup>[17]</sup>(卷7《南京书院题名记》)。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从大中祥符四年至八年在应天府书院就读,“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大中祥符八年业成及第<sup>[17]</sup>(附《范仲淹神道碑》)。该书院在北宋中期依然兴盛。位于河南登封太室山麓的嵩阳书院五代后周时建,宋至道二年(990年)七月,赐额“太室书院”和印本《九经义疏》。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增赐《九经》,以后又多次受到朝廷的礼遇。宋人李昉《嵩阳书院诗》曾谈到书院的藏书情况:“崇堂讲遗文,宝楼藏赐书,赏田愈千亩,负笈若云趋”<sup>[18]</sup>(卷2)。著名学者程颢、程颐、范仲淹、司马光等曾在此讲学,吸引了大量生徒,影响很大。

### 三、结论

通过对各类人才、书籍状况的统计分析,我们得出下列结论:北宋前期,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差距逐渐缩小,甚至有些方面(如书籍)南方文化已超过北方文化,但总体而言,北方文化还占优势地位。中国文化重心仍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北宋四都——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以及太原等地文化较为发达。南方的杭州、建州、福州、成都府等地文化较为发达。

北宋前期文化重心的形成与北宋初年的政治形势、统治者重北轻南的用人政策、中央向被消灭政权搜取文化资源、京畿文化的优势等因素密切相关。随着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统治者用人政策进行调整,到北宋后期,中国文化重心已转移到南方。

注释: 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时间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五代时已经完成说(陶懋炳《论我国古代文化重心南移成于五代》,《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4期);2、“澶渊之盟”说(肖华忠《宋代人才的地域分布及规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期);3、北宋中期末说(杨远《西汉至北宋中国经济文化之向南发展》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4、北宋灭亡、南宋建立说(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第一

篇《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三联书店1983年版);5、南宋说(倪士毅、徐吉军《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原因》,《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等

任继愈《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地域性》,《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

《之江学报》,1933年第1卷第2期。

《拓荒》第3卷第1期。

#### 参考文献:

- [1]萧统.昭明文选[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 [2]庄锡昌等.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 [3]卢云.西汉时期的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A].历史地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五辑.
- [4]季羨林.《长江文化史研究文库》总序[J].社会科学动态,2000(3).
- [5]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总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 [6]陶礼天.北“风”与南“骚”[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
- [7]梁漱溟.东方学术概观[M].成都:巴蜀书社,1991.
- [8]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A].国学论丛[C].第1卷第3号.
- [9]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0]陆游.渭南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1]陈傅良.陈傅良文集[C].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
- [12]袁同礼.中国藏书家考略[J].图书馆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
- [13]杨立诚、金步瀛.中国藏书家考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14]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 [15]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6]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
- [17]范仲淹.范文正公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 [18]李肩.济南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 马亮宽 岳广腾]

(上接第59页)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William Benton, Publisher, 1943 - 1973; Helen Hemingway Benton, Publisher, 1973 - 1974, Chicago, etc, 16:642.

[8]柳村、徐昶编.演讲词[M].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

[9]Aristotle, The "Art" of Rhetoric, Translated by J. H. Freese,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42, P. xi.

[10]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M].第8卷.

[11]汪子嵩.希腊哲学史[M].人民出版社,1988.

[12]Aristotle, The "Art" of Rhetoric, Translated by J. H. Freese,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42, P. xii.

[13]罗念生.修辞学[M].世界古代史论丛(第一集)[M].三联书店.

[14]Aristotle, The "Art" of Rhetoric, Translated by J. H. Freese,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42, P. xxxvii.

[责任编辑 马亮宽 岳广腾]